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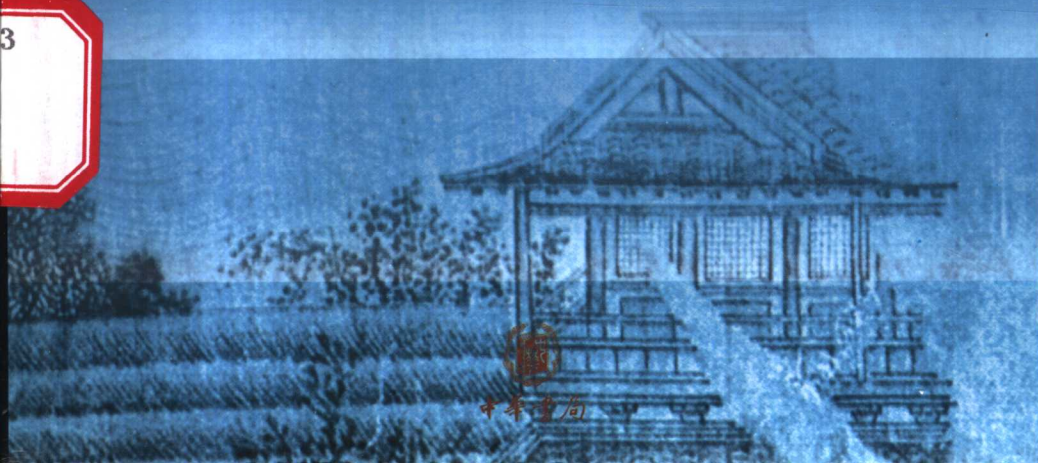
● 户川芳郎先生古稀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

中日文化交流史论集

——户川芳郎先生古稀纪念



3



中華書局

中日文化交流史论集

——户川芳郎先生古稀纪念

户川芳郎先生古稀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文化交流史论集: 户川芳郎先生古稀纪念/《户川芳郎先生古稀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 -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ISBN 7-101-03260-5

I. 中… II. 户… III. 中日关系-文化交流-文化史-文集- IV. ①K203-53②K313.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5005 号

责任编辑: 凌 金

中日文化交流史论集
——户川芳郎先生古稀纪念
户川芳郎先生古稀纪念论文集
编辑委员会编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发 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朝阳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1 印张·243 千字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8.00 元

ISBN 7-101-03260-5/Z·443

序

户川芳郎

这本《中日文化交流史论集》是为了纪念我七十诞辰而编辑的。那么,为什么我同意出版这本纪念论文集呢?

这与我曾经工作过的学校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这是因为我曾经担任过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主任教授(1989年9月—1991年3月),以及之后又继续参与了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协力委员会的工作(至2000年6月)。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简称日研中心)是日中两国政府合作建立的研究、教育机构,是一座拥有语言、文学、社会、文化四个日本专业的研究生院大学,在中国的日本学研究领域中无论是质还是量两个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日研中心的前身是由大平正芳首相提议、为培训日语教员而建立的日语教师培训班(俗称大平班)。被派遣到中国的日方客座教授们,正因为是各个领域的日本学专家,所以,与他们的一衣带水的亲近感相反,他们更敏锐地感受到了日中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于是,理解和解释这种文化差异的重任就自然地落在了我们的肩上。现任文部大臣的远山敦子女士也直接对我们谈到了此事。

这里所说的“我们”指的是毕业于仓石武四郎先生领导的战后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科的人们。仓石先生创建和经营“日中学

院”，一生全力实践着“学好中国话，做日中友好的桥梁”。聚集在先生周围的弟子们，虽然没有长期到中国留学的机会，但是每个人都极其关注着现代中国的动向，并始终保持着友好的交往。

因此，自1988年日研中心的首任主任教授林四郎（日本语学）回国以后，一直由曾受到仓石先生影响的中国学专业的研究人员担任着主任教授。他们有：尾上兼英（1988年）、户川芳郎（1989年—1991年3月）、佐藤保（1991年）、池田温（1992年）、竹田晃（1993年）、竹内实（1994年—1995年）、木山英雄（1996年）、沟口雄三（1997年）、野村浩一（1998年—1999年）、井木赖寿（2000年）、窪添庆文（2001年）。

当然，由于日中双方需要协调在教学等方面的不同想法和制度上的不同规定，所以有担任过系主任或研究所所长的经验者出任日研中心的主任教授比较合适。围绕着四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学分的计算、学位授予的方式等等，特别是在初期，频繁地和中方的李德教授、王福祥院长进行了交涉。其中，我所参与、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工作就是建立博士课程并使其走上了轨道。

在我的任期中，日研中心已经有了一批硕士毕业、希望进入博士课程继续学习研究的优秀学生。为此，一方面要在日本找到有日本学专业的博士课程、并有可能授予留学生博士学位的著名大学，寻找出进入博士课程的可行办法；另一方面必须协调好两国的各种制度。首先，我们从日本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额度中，争取到了4个四年期限的名额，同时，又努力做接受方大学研究科的工作，争取让这些留学生跳过硕士课程，直接编入博士课程。

第一名被推荐到东京大学文学部跟随辻惟雄教授（美术史学）学习的日研中心第一期毕业生漆红同学，经过了高阶秀而主任教授等人的努力，被准许可以进入博士课程。之后，我们把这种方法

向日本各大学广泛宣传,也得到了各大学的首肯。现在回想起这些过程,仍然感到由衷的喜悦。这无疑也证明了日研中心硕士课程的水平已被公认不亚于日本的大学。自此,人文科学系博士学位获得者不断增加。以下各位即是至今为止已在日本获得了博士学位的日研中心的毕业生。

李国庆(1996年9月庆应大学) 张麟声(1997年9月大阪大学) 于日平(1998年3月筑波大学) 周敏西(1998年3月国学院大学) 王成(1998年3月立教大学) 张龙妹(1998年3月东京大学) 漆红(1999年3月东京大学) 郭连友(1999年3月东北大学) 丁红卫(1999年3月名古屋大学) 李晓东(1999年3月成蹊大学) 秦刚(1999年12月东京大学) 龚颖(2000年3月东北大学) 徐向东(2001年3月立教大学) 宋金文(2001年3月常磐大学)

现在,这种推荐日研中心的毕业生进入日本各大学博士课程学习的工作正沿着既定的轨道健康地发展。

为创建日研中心这一伟业通力合作的日中双方的研究机构和各位教员们,以此为契机,也给予了在日本留学的、不是日研中心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多方面的支持,培养出了高水平的研究者,为奠定今天这样能在各个领域广泛进行学术交流的坚实基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如今,在这些有过留日经历的学生中产生了一个愿望,他们不拘泥于是否曾毕业于北京的日研中心,而希望将大家的研究成果汇总发表,这个提案对于始终殷切期望成为日中学术交流桥梁的我来说,是多么地令人高兴啊!以祝贺我的诞辰为机缘而完成此事,这令我感到后生可畏。于是,我很痛快地接受了这个提案。

我于1992年自东京大学退休,于1995年自东京学艺大学退

休,明年3月又将从二松学舍大学退休。2001年8月27日是我的七十诞辰。

(于日平 译)

2001年10月19日

序

严绍澍

户川芳郎(Togawa Yoshio)教授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日本中国学界极为著名的学者,他在中国古典思想文化和文献学等领域中留下了一系列的业绩。在近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又为日本中国学界造就了诸多的人材。今年恰逢户川芳郎教授七十岁的大寿,他的中国学生们为了纪念这位知名学者的学术功绩和向自己的导师表示敬意,在王勇教授、王宝平教授、徐一平教授和隼雪艳博士的倡导下,各自贡献出自己研究的业绩,汇合成集,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日本“中国学”是从十九世纪末期以来,日本学术界在对“万国史”(世界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并在反省江户时代传统“汉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一门近代人文学科。这一学科以东京大学(战前的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大学(战前的京都帝国大学)为学术中心,东西呼应,在二十世纪达于极盛。其中除了由于历史的原因从中异变出了一部分含有军国主义形态的学者外,大部分研究者以认真执著的态度,对中国文化的几乎所有的领域进行了以近代人文学术观念为基础的探索。依据目前我正在编著的《20世纪日本中国学(古典研究)总书目》(中华书局预刊),在上一世纪的一百年中,在文学、历史、哲学这样的人文学科的经典学科内,他们

公刊的著作(不含论文)大约有 18000 余种(精确的数字当以出版时公刊为准)。即在上一世纪的一百年中,他们以每两天出版一部中国古典文史哲研究专著的速度、规模和热情,向世界转达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观念和判断。这在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国家的学术界所能够企及的了。

当我们回顾这一段研究历史的时候,自然也看到了户川芳郎教授所留下的业绩。他在中国古文献的整理例如《荀子》和《淮南子》的日本语文的翻译和注释、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理论研究例如对“儒学史”的研究和在日本江户时代学术的研究例如对获生徂徕、三岛中洲的文献整理和理论研究中,刊行了十四部专著与数百篇论文,令人十分的敬仰。

从日本中国学的谱系上说,如果以井上哲次郎(Inoue Tetsujirō 1855—1944 年)为东京大学中国古典研究的第一代始祖,那么,沿着这一学术系统,继服部宇之吉(Hatori Unokichi 1867 年—?)、宇野哲人(Unō Tetsutō 1875—1974 年)、宇野精一(Unō Seiichi 1910 年—)之后,户川芳郎教授与沟口雄三(Mizoguchi Yūzo 1932 年—)同为这一谱系上的第五代掌门人。这些名字不仅在日本学术界,而且在国际中国学界也掷地有声。他们以各自具有个性的学术造就了二十世纪日本中国学的基本势态。

我和户川芳郎教授相识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了。1974 年秋天,由周恩来总理批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团 7 人访问了日本学术界。我作为这个访问团的成员在东京大学做了学术报告。户川芳郎教授作为东京大学接待委员会的成员,热诚地接待了我们。他与前野直彬(Maeno Naoki 1920—1988 年)教授一起为我的讲演做了非常细微的安排。由此而开始了我们的学术的情谊。

二十七年来,我一直把户川芳郎教授作为导师,而他却又一直

把我作为朋友。他经常来中国,我经常去日本,谋面之间切磋学问,我从户川教授处得到了许多宝贵的启示和知识。

户川教授说,他年轻的时候在长泽规矩也(Nagasawa Kikuya 1902—1980)教授的指导下从事“和刻本”《仪礼经传通解》的整理。长泽规矩也教授是上一世纪日本最有名望的汉籍文献学家,他对和刻本的系统的研究和整理具有卓越的成果。至于像整理《仪礼经传通解》这样的项目,即使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许多人也都会把它视为畏途。而户川芳郎教授接受了这一项目,并出色地完成了这一整理,其学术成果则由汲古书院刊出。这样的严格和认真的基础性作业,使我想起了日本中国学界具有权威意义的学者吉川幸次郎(Yoshikawa Koujiro 1904—1980)教授。1974年我访问京都大学时吉川教授对我说,他从29岁时开始在导师狩野直喜(Kano Naoki 1868—1947)指导下从事《尚书正义》的日文翻译。这是一件何等困难的作业!但是经过四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个项目。这两位杰出的日本中国学家起步的学术踪迹,给我以极为宝贵的人生经验的启示——一个人文学者,如果真的想要研究学术,无论他将来在什么方向上发展,他应该从最具有基础意义的、又是最具有经典意义的文本阅读和整理着手,接受进入学术炼狱的洗礼。否则,即使机运使他一时间成了名,然而最终所谓的成果都会枯萎而成为“文化垃圾”。这几年,我一直把这样的经验告诉我的年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他们有的相信,有的则十分的鄙视。今年,我有学生进入了美国哈佛大学,继续做她的博士论文。她来信说,到了哈佛才知道所谓世界第一流的“哈佛学风”就是先生反复说的以文本解读为基础的学术。这本来是人文学术界应该遵循的基本法则,但是现在因为学术界的腐败风气,已经相因成习,使不少的青年学者迷茫失途。在这个时候,我们借他山之石,以我们尊敬的户

川芳郎教授的学术的经历作为范本,或许可以给我们以许多的启示。

在户川芳郎教授的学术进程中,还有三个方面的经验给我的印象至深,常常与自己相互比照,觉得很有意义。

户川教授是一位中国学家,对日本来说这是一种外国文化研究。但是我们从户川教授的业绩中看到,日本江户时代杰出的学者《获生徂徕全集》(获生徂徕 1666—1728 年)的第二卷则是由他和神田信夫(Kanda Nobuo 1921 年—)教授二人合作整理编纂的。前年(1999 年)他又与石川忠久(Ishikawa Tadahisa 1932 年—)教授一起完成了《三岛中洲的学艺与他的生涯》(三岛中洲,1830—1919 年)这部大著。一个从事外国文化研究的学者仍然十分执著于自己民族的文化的文化的研究。我以为这对于我们应该是很有提示性的价值的。统观中日两国上一个世纪中真正有成就的学者,无论他从事何种具体的研究,他们在自己民族文化的根上是从来十分认真、十分执著的。户川芳郎教授的学术正是体现了东亚学者最有价值的学术道路。

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古典哲学的学者,户川教授还对中国的现代文化具有浓烈的兴趣。1986 年他到中国来,专门为着访问鲁迅的遗迹。我当时真有点奇怪,按照我们的学科分类,古代和现代泾渭分明。但户川芳郎教授专门飞渡重洋,寻访一位中国的现代的作家,他有自己的信念。我陪他从西城转到南城,他准备的书面材料连当时在场的北京鲁迅博物馆陈列处的一位副处长也深深吃惊。户川先生说,对我们这一代日本的中国文化研究者来说,无论是研究古代的或是研究现代的,在大学期间几乎都阅读过鲁迅的作品,这是一位深刻表现现代中国命运的作家。我研究的对象是古代,但我生活在现代。假如我对活着的中国的命运和文化没有

知识的话,我想我是做不好对中国古代的研究的。户川芳郎教授在这里表现了深邃的思想和眼光。

1990年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与日本日中关系史学会联合在北京举行东方文化研讨会。会上为一个问题中国学者之间发生了争论。争论是由我挑起的。在关于如何估价儒学在日本当时所谓经济腾飞中的作用时,我在30分钟的发言中强调要从日本社会发展的事实出发,并且应该十分注意总结战前儒学在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作用。会议的中方出席者除我之外,同声认为日本经济的腾飞的基础在于儒学。作为日本方面的学界的真正代表(日方参加者以经济界和政治界为主)户川芳郎教授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一个逐渐连汉文也读不懂的国家里,怎么可能以儒学为原动力来推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呢?户川芳郎教授当时担任着东京大学文学部部长,这样一个显赫的学术职务足以使在他之后的其他日本发言者谁也不对这个尖锐的议题说什么了。现在,当日本经济已经十年衰败而仍然无法真正从低谷中提升的时候,我常常想起这一场会议以及后来发生的争论,想到户川芳郎教授在理论上的深刻性和坚定性以及在此背后的丰富的学识和实事求是的学风。

今年是户川芳郎教授的七十大寿,我写了上面这些话。从回忆中钩沉起先生的道德文章,可以成为后辈的风范楷模。恰逢这本论文集的组织者约我为户川芳郎教授的寿庆写几句话,引起了我的许多的沉思。半个月前,我在早稻田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日本古典《万叶集》中《水江浦岛子》这一首和歌的解读发表见解。户川教授以七十岁的高龄专程赶来参加研讨会,使我十分感动。在这本纪念集中,论资排辈实数我年纪最大。因为虚长了岁数,纪念集的组织者非常客气地把我的这些

文字做了本集的序言,令我十分的不安。假如读者能够在本集中对户川芳郎教授的学术有所理解,从而能从他的学术道路和人品风范中体验自己所需要的价值,并且对经由他所培养的这么多的弟子门生所展现的学术实力有所领悟,从而能够体察到先生当年培养学生的苦心,那么我想,这是对一位把对中国古典的研究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并且业绩蜚然的日本老学者的寿庆的最好的庆祝了。

写于日本东京品川丰町寓所

2001年10月16日

目 录

序.....	户川芳郎(1)
序.....	严绍璁(5)

郭象的政治思想与他的《庄子注》

——以“极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适”所示的意图 为焦点.....	户川芳郎(1)
------------------------------------	---------

古代日本的粗陶艺术

——兼释“绳纹维纳斯”之谜	王 勇(37)
户川芳郎先生和生成论研究	钦伟刚(51)
鸦片战争与吉田松阴的思想形成	郭连友(63)

日本人的无常观与歌道的形成	隼雪艳(90)
由汉籍的翻案看日本文学的特点	

——以《唐物语》为中心	美国华(112)
近代日本修养主义的话语空间	王 成(127)

《学部通辨》在中国、朝鲜、日本的传播	龚 颖(139)
内藤湖南关于清朝史的研究	钱婉约(154)
一位日本中国学家的留学日记	

- 《述学斋日记》…………… 陈 捷(188)
明代刻书家胡文焕考…………… 王宝平(239)

因果关系句中中日文的不同

- 关于日文的“から”句和中文的“因为/所以”句…………… 于日平(258)
近代日语对汉译西书新词的吸收和发展…………… 孙建军(283)
日本传统养老模式的研究…………… 宋金文(307)
- 户川芳郎教授简历…………… (328)
户川芳郎先生古稀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成员…………… (330)
后 记…………… (333)

郭象的政治思想与他的《庄子注》

——以“极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适”所示的意图为焦点

户川芳郎

序

一般认为，魏晋南北朝思想史的研究，关于在总体上被人称为玄学的道家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西晋末年展现在郭象(252?—312)《庄子注》中的哲学体系所作的系统研究，经过了委婉曲折，一直到了现在，才得出了若干的定论。^①在这些研究中，侯外庐等所著的《中国思想通史》，维持了相当高的研究水准，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总的来说，传注义疏的态度，对经典所作的训释，到了近世以后，其解释学的倾向开始变得很显著。近世以后，处理文献古籍时，文献学操作的比重开始增加，人们普遍意识到要把文献当作学界的共同遗产，这时，文献训释的态度，就和考证式注释的风格相异，它的解释学倾向就明显起来了。文献古籍作为训释对象，具有经典秩序，具有自己的权威，解释者把它作为自己立场的根据，他们渐渐地以这样的立场为前提，他们通过文献解释的形式，想从思想的侧面，把与他们自身相关的历史和社会的要求表现出来、实现出来。这样的倾向，就是所谓的“经学”的倾向。这样的特征贯穿

了整个中世纪的神学。所以,训释带有二重性格。训释要兼备(对经典的)理解和发现这两个侧面,既要经文词句作详细的说明和解释,又要把经典的思想内容合适地应用于现实,并且,这两者的统一,作为训释者的独创,还具有这样的性质:即它们应该得到各自时代的特定评价。所谓的汉唐训诂学的本质,并不仅仅是章句的解释。这样的认识,现在已经用不着再去评说了。

我们还要进一步考察郭象的庄子训释,考察郭象的思想。可以认为,在西晋时代“儒道综合”的风潮中,郭象不断地凭藉着作为“经典”的庄子的(思想)内容,凭藉着这些内容所固有的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宗派性,“天才”而合理地解释了现实政治社会的矛盾,郭象还助长了儒道折衷的风气,并为自己政治实践的意图作了辩护。当郭象的庄子训释被这样评价的时候,从《庄子注》三十卷中去窥视神学解释学的典型形态,就会成为我们当然的要求和必须完成的作业了。

大家都知道,后汉时代的各门学问,如何休的春秋学和郑玄的礼学等,都巧妙地调整和统合了各个时期的支配体制内部所发生的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何休和郑玄等人,根据自己的理念,果敢地对经典作出了独创性的解释,他们的理念是要维持体制的存续。郭象的训释,表明了他的解释与经典内容相对独立,表明了他的解释形成了独创的思想体系,具备了历史现实性的内容。郭象的训释,由于以训诂形式为条件的“独立”同时又是寄生性的权威的影响,训释中经典与解释的关系,可以被赋予自己的特征。由此,注释自身保有历史现实的价值,作为“经典”的庄子又规定了训释的权威性,规定了承认训释的范围,这样,注释与经典之间的特殊的相辅关系,经常会出现问题。但是,本稿打算容许把道家经典《庄子》与儒家经典进行比较,容许所谓的黄老风格的“恣意”性的解释